

进兴 反思“中国哲学合法性”的论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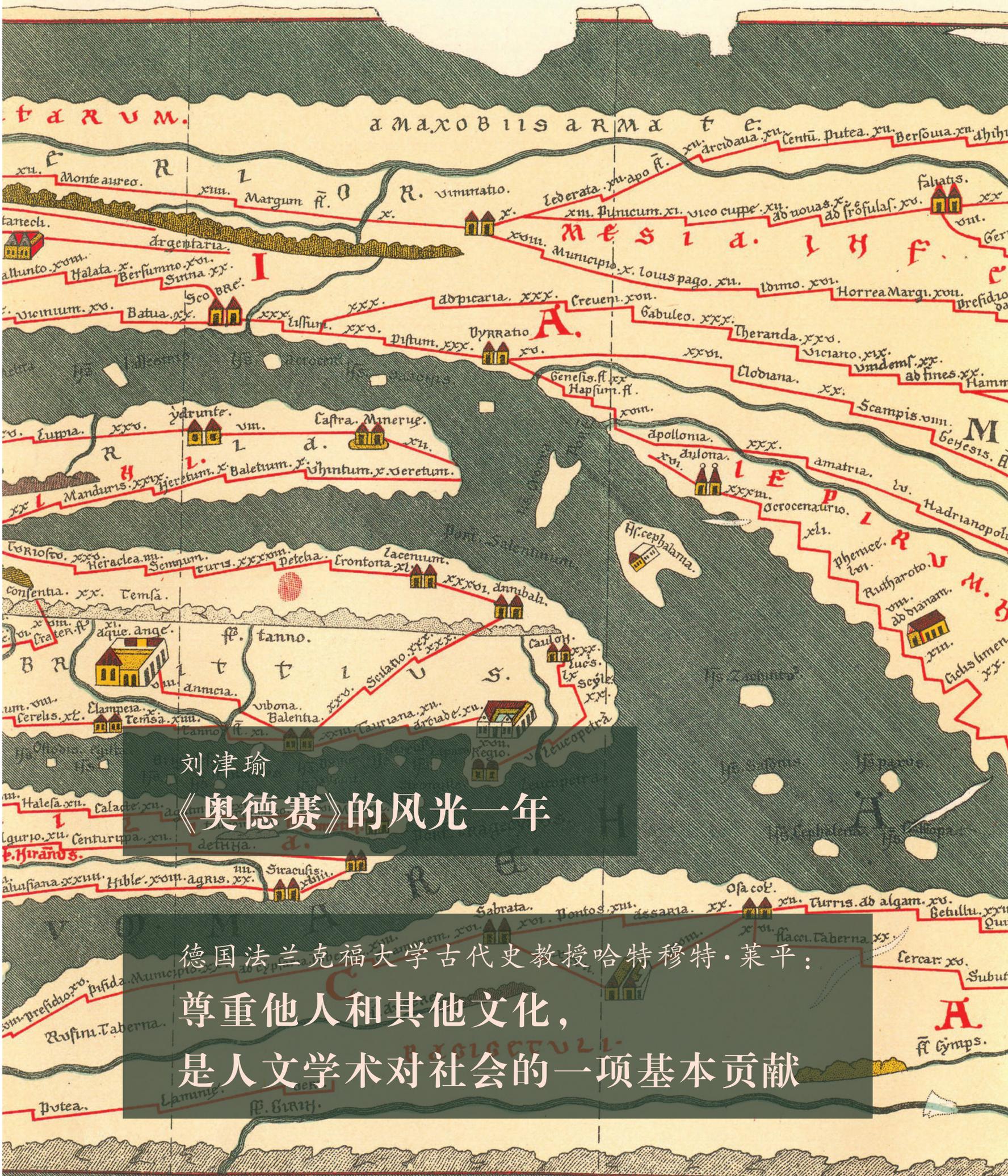
徐冲 两方墓志与三场葬礼

周景良 我父亲和酒

王健 汉斯·希伯的中国之行

文匯 学人

第 351 期 2018 年 7 月 20 日 星期五



刘津瑜
《奥德赛》的风光一年

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古代史教授哈特穆特·莱平：
尊重他人和其他文化，
是人文学术对社会的一项基本贡献

莱布尼茨奖获得者、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古代史教授哈特穆特·莱平：

尊重他人和其他文化， 是人文学术对社会的一项基本贡献

本报记者 李纯一

叙利亚之前没有引起古典学者的注意，因为它看起来不那么“古典”

文汇报：您在讲座中提到，聂斯托利派非常强调他们的“罗人”身份。讲座后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怎样辨识身份认同的：如果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，在同一处生活，就能说他们享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吗？我想知道，他们那时候是用什么词，来表达这种分别？因为那时候的人也确实面对和认识到这一冲突，但“认同”这个概念是一项现代发明。

哈特穆特·莱平：我想，使用某些现代概念来分析古代社会还是正当的，如果它们很好地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。但你还是得回去读那些史料(sources)，去看和它们或多或少相联系的是些什么概念。虽然在古代语言里对于身份认同没有一个抽象概念词，但有很明显地区分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。

不过，要注意的是，每个人都有不止一种身份认同。从来没有一个单独的身份。比如我们，不只是中国人或德国人，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认同，比如信仰、教育等等。而我们对古代的身份认同通常会抱一种过于单向的视角——史料只能让我们认识到古代世界的一小部分；我们因此对精英阶层了解得比普通大众多得多，因为写作这些后来成为史料的人，通常都是受过教育的，能说会道。定义身份认同的危险就在于，他们看起来太过整齐划一，太片面了，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身份认同都被简化。

例如，古代叙利亚人会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村庄、一座城市、一个行省，或是罗马帝国，或是波斯帝国，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属于某个信仰、某个语言社区，等等。我想在现代的讨论中，很有必要认识到，今天我们是不是把人简化到只有一个身份认同了：只是美国人、只是英

“古代中国与欧洲地中海两大族群系在一——侵略成性的游牧民族，以及崇尚和平、叙利亚的斯托利派。”斯托利派后来来到中国，将自己的文本和思想翻译成中文，安安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就记录了些努力。3月17日，莱布尼茨奖获得者、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古代史教授哈特穆特·莱平(Hartmut Leppin)在东北师范大学演讲，主题是5世纪叙利亚斯托利派的身份认同。“我的研究主题是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历史，理一时段一地区，就必须住，了希腊和拉丁，有很多其他。因此我开始对叙利亚感兴趣。”听莱平教授的人，会惊呼“您应该去唱歌”。他平稳、厚又明亮的嗓音穿堂，在你头，就像光穿厚厚的云层直大地。年时的莱平确实一度很想当歌剧演员。因此，他也研究罗马帝国的假想认同。座期，莱平教授接受了《文汇报》的采访，谈及他如何受到叙利亚作家利巴尼乌斯的吸引投入古代史研究之外，分享了他对历史分期、不同代和国别的研究差异、为公众写作以及古典学新的看法。

国人，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。

文汇报：叙利亚地处要冲，长久以来暴露在多文化和多种传统之下。现在这个古老国家及其语言在古代晚期的研究中，有着怎样的位置？相关文献现在主要在什么地方？

哈特穆特·莱平：长久以来，叙利亚这片地区并没有引起古典学者的很多关注，因为它看起来不那么“古典”——也就是你说的包含多种文化与宗教。而这也恰恰是今天人们对叙利亚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：这是一片多元文化的区域，丰富而危险。手稿现在分散在各个地方，许多欧洲、叙利亚的图书馆和修道院都保存有副本，但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留存下来，许多手稿很可能已经被毁。

文汇报：我注意到您也研

究罗马帝国对宗教和文化多元的容许与限制。不知这一研究是否有现实动因——为了回应德国的现实，或者是希望使之同古典时代的处理方式联系起来，探索更多的宽容和共存方案？

哈特穆特·莱平：有一些事必须为大家所知：从来不存在一个完全单质化的社会，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。一个社会总是要和多元性打交道的。对我来说一件重要的事情是，要看看我们可以怎样处理多元性，看看哪些是共通的，哪些是中间地带。当代德国在宪法里写入了一些核心价值观，对每位居住在德国的人、不论是否德国人，都是强制性的，这些规定就是对其他生命及其权利的尊重。

还有一点，是必须要有一个中间地带，让人可以独立于

自己的立场进行讨论。在这方面，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古代、在今天都具有非凡价值——因为他的逻辑论证的想法。如果你看看德国极端分子的某些言论，会发现许多毫无逻辑基础，由此你可以和他们辩论，然后指出他们谬误的地方，当然他们不会就这么罢休。为了一个社会的凝聚，找到一个办法，让每个人都遵守逻辑辩论的一定准则，找到共有的、中立的论辩地带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在这方面，学校很重要。因为学校可以训练你以某种方式辩论——能被其他人接受的方式，也能够倾听别人。在德国，学校也是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相遇的地方。许多现代社会里的人只和他们自己社会阶层的人接触。但如果是在公立学校(德国意义的公立学校，受政府资助，而非英国意义上的)，就是

不同的人能够相遇、相聚，一起学习的地方。这是一项必须维系的重要传统。

当然，还必须有一些强制措施。例如，在德国，就必须使用通用语——德语。虽然人们常会说穆斯林融入现代德国社会很难，但我的学生里就有很多学业上相当成功的穆斯林同学。一些刚来到德国的人，他们过去生活的社会可能建立在某些不允许讨论的准则上。他们不必放弃自己的宗教，不必放弃自己的语言，但在某些地方，他们必须说德语，也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，以别人希望的方式来行为。

文汇报：您所接触的叙利亚古代文献里，有否提到过东方世界？



哈特穆特·莱平

C.H. BECK GESCHICHTE EUROPAS

Hartmut Leppin
Das Erbe der Antike



哈特穆特·莱平在《古代的遗产》(C.H. Beck, 2010)里想要着重说明的是，在西方古代史里，古代并不是欧洲，但总是被视为欧洲传统；固然没法脱离古代理解欧洲，但又不能把古代削足适履进欧洲的概念。

◀ (上接4版)

哈特穆特·莱平:只有一些泛泛的评论。地中海世界的人们甚至都不能区分印度和中国。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东方。

不过,对于源自波斯的聂斯托利派的叙利亚语史料作者,我们也了解得不多。我们了解的多是罗马帝国的。有一位6世纪的聂斯托利派的史料作者科 斯 马 斯 (全 名 Cosmas Indicopleustes,指“去过印度的科 斯 斯”),是个商人。他对东方有更准确的看法,但他不相信地球是个圆形,他认为是平的。科 斯 马 斯 有些与众不同,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僧侣,当然他还是十分虔诚的。

古代有许许多多的史料作者,个个在智力上充满挑战、极富趣味,像修昔底德、柏拉图等——但我们要知道,这幅知识图景也是片面的。阅读柏拉图固然愉快得多,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文本来源,我们也会喜欢一些更接地气的写作者,例如商人。这方面,叙利亚语文献里很少,因为主要是僧侣和神父在写作。

我们三人都变成古典史方面的教授,与阅读利巴尼乌斯有关

文汇报:您的研究领域是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,您怎么定义这个时段?法国学者雅克·勒夫(Jacques Le Goff)有一本书,名叫“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”,他有一个新的概念“长中世纪”——非常长,从5—18世纪。您对历史分期有什么看法?

哈特穆特·莱平:从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看,我是从一位古典历史学家起步的,主要研究罗马史、罗马铭文,还有修昔底德。但我很早就对古代晚期感兴趣,因为这一时段(特别是基督教与异教之间)知性概念的交换非常之多,这点非常吸引我。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是,新的信仰如何处理与过往文化的关系。曾有一个讨论,古代晚期到底是不是古代的一部分。以前的《剑桥中世纪史》是从君

士坦丁大帝写起的,但现在不是了。

德国的许多古典学家倾向于说,当基督徒变得主导时,就不再是古代了。但如果你从政治架构的角度看,西罗马帝国一直持续到5世纪。东罗马帝国则持续到了15世纪。

在我看来,分期始终和你所处理的问题视角有关。你可以说,有一个一直持续到8世纪的长长的古代晚期,我们普林斯顿的同仁彼得·布朗(Peter Brown)就是这么坚持的。他认为欧洲真正的变化要到查理大帝,公元800年时,他是第一个被教皇加冕的北方皇帝。这一组合在罗马帝国时代是边缘化的,教皇还是个新鲜事物。但如果你看得更细一些,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,法国南部都一直使用罗马法,而法国北部用不一样的法律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延续性。

如果你再看看智性发展,对我来说,最具决定性的不同是7—8世纪由阿拉伯人的扩张带来的。但是仍然,在这些区域内部,还是有不同。我一直感兴趣的是,哈里发王朝重新将

古典艺术介绍到西班牙。西班牙早前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,也被古典艺术所塑造;之后西哥特人统治西班牙,不愿或无法维系古典艺术;阿拉伯人到来时,则重新带来了古典艺术的形式、立柱,他们也阅读古典文本。因此,事情是很复杂的。必须有分期,才能让海量材料变得有条理,但是古代历史里又从来没有一个天定或任何人给定的分期。问题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分期。

对叙利亚来说,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分期就不成立。前阿拉伯时代和后阿拉伯时代,才是改变整个叙利亚社群的处境的分野。

我们历史学家对这种具体到年的划分,也是非常当心的。不过话说回来,我认为古代晚期应该持续到公元530年代,但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可能就会给出另一个年份。而将来的人如果回看我们这个时代,他们可能会觉得1989或2001年是最重要的时间。所以我认为,在历史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教给人们多重的视角。要认识到,不同的人、不同的社会实体,对历史有不同的观看视角。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、“真实”的、线性发展的历史。

文汇报:古代晚期是很晚才跃起为独立的研究时段的,是吗?

哈特穆特·莱平:是从19世纪开始的。最早是德语里出现“古代晚期”(Spätantike)一词,这个词想要表述某种衰落,spät是晚的、走下坡的、破败的意思。如果画像里的脸变丑了,人们就会用spät。因此“古代晚期”一开始是个贬义词。到20世纪早期,出现了变化。艺术史学家阿洛伊斯·李格尔(Alois Riegl)强调说,了解每一个时代对于何为艺术的想法都是重要的。他引入了Kunstwollen这一概念,这是个非常德国的词,很难准确翻译。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对什么是美的想法。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同样也为了尊重其他的传统。

文汇报:您是如何开始对这一时段感兴趣的?

哈特穆特·莱平:有一个我个人经历里的关键时刻——是在马尔堡大学的一门课程,老师是马尔科姆·埃林顿(Malcolm Errington)。这门课有三个学生,我们的阅读材料是一位4世纪的叙利亚异教作家利巴尼乌斯(Libanius),当时,他所生活的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基督教化。利巴尼乌斯是一位古典传统下的教师,他写下他

自己所经历的变化。最后,甚至连看一眼神庙都不被允许了,因为基督教禁止人们显示出哪怕一丝异教崇拜的迹象。我们看到他如何绝望地捍卫自己所受的教育,捍卫他所热爱的传统。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文本,也是非常难读的希腊文。我想最后我们三个人都变成古典历史方面的教授不是偶然,就是与阅读利巴尼乌斯有关。

另一个因素是生活在一个可能威胁你核心价值观的世界的经历,这种感觉在1980年代尤其深刻。那时候我们倾向于将古代晚期沿着冷战意识形态冲突的线索来解释,两边都感觉另一种文化在威胁他们,但是现在,则是宗教在现代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,结果这一想法同样也影响了我们对古代晚期的研究。这是2001年事件的结果,也是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落幕的结果。

现在,我们在德国就在讨论。例如,在我太太的学校,就有关于穆斯林女生是否应该上游泳课的讨论,是不是应该被看到身穿泳衣。这个案子最后到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,他们说可以,学校有权利强制女生这么做,她们可以穿“布基尼”(burkini),一种遮盖身上绝大部分的泳衣。

家长们还提出一点:女生们不应该看到那些半裸的男人。然而,法庭裁决说,在我们的社会,看到这样的是正常的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辩论的许多议题之一。其他讨论还有关于哪些场合允许戴面纱,如果穆斯林教师们不准戴面纱,那么教师中的修女可以戴十字架吗?这是一个很艰难但是引人入胜的讨论过程。

在古代晚期,我们会看到这些新的区分是怎样产生的。有一种社会理论叫“系统理论”,是一种很复杂的方法,但简言之,如尼可拉斯·卢曼(Niklas Luhmann)所说,社会不是被人们定义的,而是被他们认为重要,或赋予重要性的分别和差异所定义的。

在公元1世纪,对于基督徒来说,他们必须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肉。因为古代文化里大部分的肉都来自献祭,祭司会卖掉这些牺牲来赚钱,这是他们获利的一个重要途径。问题是,那时候基督徒是否被允许吃那些来自异教献祭活动的肉。

不过,你可以抱着中立的态度来讨论古代吃什么肉,但在今天的社会讨论同一问题的时候,一定会有情感上的代入,很难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,

叙利亚的本土语言

罗马帝国境内存在多种传统,其流和传承的情况大体包括如下四类:其一,于精英层、渐成为官方书的拉丁和希腊;其二,利尼亚(Lycaonian)、凯尔特(Celtic)等省平民使用的本土方言(多以口头形式流传);其三,希伯来、埃及等具有悠久文学传统的方言(公元135/136年的巴尔·科赫巴起义[Bar Kokhba war]遭镇压后,希伯来语文学一度中断);最后是由基督教传播产生的方言兴势(vernacularisation),其中尤以科普特(Coptic)和叙利亚(Syriac)为代。尔·波洛克(Sheldon Pollock)在其印度梵语研究中指出,地方的复兴存在“literalisation”(日常用的化用)和“literarisation”(诗歌等形式的文学创作)两种径。以于埃及圣书体

(hieroglyphs)的科普特为例,其在吸收了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得以简化,不仅是人们日常习用的,也是文学及宗教经典的传播体。因此,科普特的兴具了“literalisation”和“literarisation”的推动作用。

叙利亚语文学的发展

叙利亚源拉美(Aramic)的埃德方,有时用楔形文字(cuneiforms)形式写成。在两河流域兴的亚、巴比伦、波斯等东方帝国皆以拉美作为官方政。亚历山大东征、希在东方传播后,拉美仍是当地的用(lingua franca),并且是奥斯埃尼王国(kingdom of Osroene)的官方。根据叙利亚基督徒的法,稣本人曾授命奥斯埃尼国王布加五世(Abgar V)保护当地基督信众。因此,叙利亚人拥有和上帝的直接系。公元2世纪,叙利亚人巴尔德沙

尼斯(Bardesanes)以对体写成第一叙利亚作《国律法书》(Book of the Laws of the Countries),奠定了叙利亚文学的基础。另一方面,发现于瓦·埃·纳特恩的大古代叙利亚修抄本系古典文献的文和注,如哲人波尔利乌斯(Porphyrus)的作品。其中有叙利亚文献,如富有斯多哲学彩的“尔拉皮翁之子拉(Mara bar-Serapion)的书信”,以及米南德(Menander)戏剧的本,些有明显的异教古典传统痕。

公元2—3世纪,称为“本”(Peshitta)的叙利亚新、旧约圣经成,塔提安(Tatian)写成《四福音书合参》(Diatesseron),叙利亚文学渐兴,并于4世纪于繁。着珊波斯(Sassanides)的崛,叙利亚再度成为罗与东方帝国的力场,由于基督教会已成为罗马国教(珊波斯则大屠杀基督徒),厄弗姆(Ephrem)等人极力宣扬亲罗政策。

(摘自哈特穆特·莱平“古代叙利亚基督徒的身份认同”讲座,翻译:吴桐)

访谈录

← (上接5版)

因为你卷入太深了。

文汇报:您刚才提到一个社会理论,能否谈谈您怎样看待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?

哈特穆特·莱平:我们所有人都在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观念,从社会学、经济学和其他领域借用概念对我们非常有帮助。但我们总是会看到,这些模式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泛。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历史和人类的多样性带进来,这个形式,也是一种道德要求——看到古代历史中的个体,给这些个体以发声的权利,倾听他们,不仅仅说你是属于这个或那个社会团体的。要看到他们个体的分歧、争论,看到他们各自面对的问题,个人如何面对整个生命进程遭遇的困境。

在这里我要提到19世纪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·布克哈特(Jacob Burckhardt)。布克哈特对其他人、其他古代文化都心怀敬意,这是相当重要的,这也是人文学术给社会的一项基本的、重要的贡献。因为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尊重他人的理念之上,我们也试图教出这些。这并不意味着你接受所有东西。每个社会都需要规则,需要定义什么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。你必须能够理解另一方的想法,必须对其他人抱有基本的尊重。

我们的老师非常注重社会架构,于是我们更关注具体的行为体

文汇报:德语世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,相比英语和法语世界有什么特色?

哈特穆特·莱平:我们很看重行政架构,我们对英国学者不重视法律感到非常失望。我们对神学问题非常感兴趣,我们也有一些独特的哲学传统。所以确实是很不同的。还有一点,实际上语言对你表达的内容有很大的塑造。我们用德语写作,也用英语,但是用英语表达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写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东西。以及,我们有一些特定的词汇,不是能够完美对译到英语的,例如前面我说的“Kunstwollen”。

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,对法律有全然不同的概念,法国人和德国人对于总体的、精

确的成文法非常看重。我们没有判例法。

在古代早期,罗马法主要是判例法。罗马法里也有矛盾之处,因为大部分法律其实都是皇帝对提问的回答。法官或其他人定义问题,然后询问解决方案。或是从皇帝这里得到回答,或者是查阅相关的评论。皇帝的回应和评论在古代晚期被收集起来,而那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试着整理成体系的东西。现在,欧洲大陆的历史研究多强调法律架构,而盎格鲁-萨克逊的同仁们更喜欢研究判例,也更倾向于接受特例。在这个意义上,他们可能更接近于古代,但他们是不是总是正确,我不太确定。特别是,有些评论固然包含清晰的法律概念,但这些评论被看得跟法律同等重要,从我们现代德国人的角度来看是很奇怪的。虽然德国的法学教授也很喜欢写评论,但那没有约束力,只是供给法官参考用。所以,盎格鲁-萨克逊的方法要比大陆的方法灵活得多,在这方面,我想我们和法国、意大利人更接近。

文汇报:我看到您写过关于罗 社会娱乐与娱乐从业者的文章,讨论演员和角斗士。您也写教父和皇帝。在这么多的人里,您为什么会以这些人为写作对象呢?要知道还有很多历史学家的关注点不是人。

哈特穆特·莱平:我想这可能还是和代际有关。因为我们的老师非常注重社会架构,注重抽象发展,于是我们就会对具体的行为体投入更多。

对娱乐从业者的关注,其实有一个很个人的原因——我一直都很想成为一个歌剧演唱家。我对这类文化一直很感兴趣。娱乐业的这一类史料大多出自纪念某人的拉丁铭文,读这些铭文,你会了解到,在丧葬铭文里、在他们叙述自己成就的诗歌里,他们看重的是什么。



18世纪的利巴尼乌斯画像



科斯 斯绘制的世界地图

在社会主流的眼中,他们被视为怪人,但他们还是很想把自己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。因此,我们可以看到史料中的这一有趣张力。

文汇报:您的专著《古代的遗产》(2010)广受欢迎,为公众写作对您来说算是一种公共服务吗?

哈特穆特·莱平:确实,这本书是为更广泛的读者,而非专家写的。我想要着重说明的是,在西方古代史里,古代并不是欧洲,但总是被视为欧洲传统;你没法脱离古代理解欧洲,但又不能把古代削足适履履欧洲的概念,因为古代还包含伊斯兰的传统。我宁愿使用的是“欧洲-地中海”一词。我们所称的大部分欧洲传统,实际上是西欧传统,跟欧洲东部的传统是很不一样的。东正教跟天主教、新教很不同。现代俄罗斯的行政体制和东正教会之间仍有很强的联系,这在西欧是不可能的,但这也属于欧洲传统。

我很重视为公众写作——我们是受公家资助的,我们也有很重要的话要说。有一些写古代的人没有专业知识,通常比我们写得更流利。但我想还是我们更可靠。并且,如果我们有在这一领域做研究的特权,

如果我们想鼓励年轻人投身同样的事业,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在中学课堂里呈现——那么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重要性之所在。

写作公众读物也是一项乐趣。我还写过给孩子的古典民主呢。有些十来岁的孩子会写信给我。收到这些信真是开心极了。在给公众和专业研究者写作之间,其实有一个中间地带——写给其他学科的同仁看。我就写给神学家看。例如,我最近要在欧洲神学家大会上发言,展示我的想法,肯定会受到很多批评,但一定也会极有收获。

文汇报:21世纪以来,古典学研究有些什么新的视角?是否有类似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这样的重大变化?

哈特穆特·莱平:德国有一句著名的谚语:历史应该是将欧洲地方化(provincializing Europe),和/或不再以欧洲为中心(decentering Europe)。这是关于将古典学去古典化的(declassifying classics):我们看到,古代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文化,不止是古典文化。在这个意义上,古典学不是欧洲的,而是全球的。

有一个人们称之为“重新语文学化”(re-philologization)的进程。文本和文本细节变得越来越重要。这和语言学转向有关。另一个极大影响本领域的转变,与历史学总体的转向有关:空间转向(the spatial turn)。地理学,是历史和考古学之间的地带,变得越来越重要了。我对这一领域没那么关心,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:了解人们如何想象世界,看看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地图。有一幅古代地图《波伊廷格古地图》(Tabula Peutingeriana),看起来很像现代的导航系统:你会看到城市之间的连接,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连接方式。

去研究那些现在不怎么时髦的领域,是我们的责任,你必须

完整地保存这些知识。否则,只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,是没法看到完整图景的。因此,为了抵抗沉浮导致的知识消亡,你必须非常保守:保存现在已有的,保存知识,保存传统。

德国的学术体系以制定长期计划闻名,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“希腊铭文集成”,一直持续到今天,而且质量保持不坠。这一传统是非常特别的。固然很难维持,但我们到今天还是努力坚持,虽然他们真的不够入时。

文汇报:那么在艺术史方面呢?彼得·伯克(Peter Burke)使用图像和视觉材料作为历史证据,这是一个重大的方法变革吗?

哈特穆特·莱平:大多数古代史学家都是受语文学的训练,有些是受考古学的训练,但理想的是每位古代史学者都能处理艺术制品,因为艺术品可能是很重要的信息来源。

我会带学生们去考古艺术博物馆,向他们展示一些重要的花瓶和铭文。你必须如解释文本一样,批判性地解释这些艺术品。许多学生觉得考古学相对轻松,跟处理文本的难度不好比,因为面对艺术品没有什么语言壁垒。然而,你必须教会学生们,这些艺术品可以有多复杂。

视觉材料很重要,因为古代史的某些阶段,如荷马之前的时代,是非文字史料占主导——几乎没有文本,但考古材料很多。每个古代史学者都被期待在其研究里包含物质文化。如果你想讨论一位罗马皇帝及其各种呈现,那么钱币、画像、雕塑这些都得要看。

彼得·伯克做的研究很棒,很出色。但是从方法上来说,对我们不是新鲜事,对于那些研究更晚近时代、但同样接触很多考古材料的学者,也不那么新鲜。